



Title	1971年以前日本の二中議政
Author(s)	川島, 真
Relation	國史館主辦「台灣1950-60年代的歷史省思-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八屆討論會」(第四場, 主席 林正以, 評論人 許慶雄, 2005年11月24-25日, 國家圖書館)
Issue Date	2005-11
Doc URL	https://hdl.handle.net/2115/11304
Rights(URL)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1/jp/
Type	conference paper
File Information	academia_historica_paper_chinese_kawashima.pdf



1971年以前日本的二中議政

川島真

北海道大學副教授

前言

戰後初期的東亞國際政治，在現今的日本國際政治史學界可以說是一個『紅門』。這也許是因為在歐美外交文書公開的同時，戰後的日本外交文書也被公開的緣故。另外，冷戰結構漸趨和緩，迎向全球化時代的東亞，在摸索新的國際秩序的當下，也該對歷史重新再做一番回顧。

在這個領域，從前有部分研究是以石井明、別枝行夫等人為首，但近來許多年輕學者也陸續有著作發表。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陳肇斌《戰後日本の中國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年）；袁克勤《アメリカと日華講和—米・日・台關係の構圖》（柏書房，2001年）等。最近則有池田直隆《日米關係と「二つの中國」—池田・佐藤・田中內閣期》（木鐸社，2004年）等備受注目的著作出版。其他，即便將範圍設定在『兩個中國』之下，仍有田麗萍〈池田內閣の中國政策—封じ込め戰略と對中積極論の狹間で〉（一・二）（《法學論叢》京都大學，137卷2號・139卷1號，1995年・1996年。）及〈佐藤內閣と中國問題—狀況對應型外交、その意義と限界〉（一・二）（《法學論叢》京都大學，141卷5號・143卷3號，1997年・1998年）；佐藤晉〈佐藤政權期のアジア政策〉（波多野澄雄編《池田・佐藤政權期の日本外交》（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進而，還有神田豐隆〈佐藤內閣と「二つの中國」—對中・對台灣政策にあけるバランスの摸索〉（《國際關係論研究》21號，2004年）。若限縮在日台關係上，石井明及清水麗的研究都表現得非常好。石井明〈1960年代前半の日台關係—周鴻慶事件から反共參謀部設立構想の推進へ〉（《國際法外交雜誌》101卷2號，2002年8月）。清水麗〈1970年代の台灣の外交政策に関する一考察—外交と內政と中台關係の相互作用〉（《東アジア地域研究》6號，1999年）及〈蔣經國時代初期の對日政策：日台斷交を一事例として〉（《筑波大學地域研究》，1999年）。在台灣，有許多相當於史料的著作：馬樹禮《使日十二年》（聯經出版社，1997年）、黃自進記錄的《林金莖先生訪問記錄》（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而從嶄新觀點出發的研究也多有所發展：廖鴻綺〈貿易與政治：台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以台灣所藏外交部檔案為中心之探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6月）；另外在日華、台的研究方面，日華條約、「以德報怨」、周鴻慶事件、日台斷交等等的事例研究也一直都有所進展。

從上述諸先行研究的成果來看，撇開安全保障方面不談，特別是在通商的部分，可以發現日本的外交未必完全追隨美國的腳步，有時也與英國有所合作。不論在大英帝國「黃昏」之後的東南亞市場（特別是印尼）之擴張發展，以及中國市場

開始改革開放，亞洲市場的確保及亞洲經濟發展已經成爲自身經濟發展的基礎，而不得不全力發展。這一點也是日本的戰後處理政策及對共產主義政策，兩者所共通的方向性¹。如此一來，「二個中國政策」是戰後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雖然把中華民國政府視爲代表中國的正統政府而給予承認，卻也將中國大陸當作通商對象而努力發展。不論是吉田茂首相時代上海貿易事務所的開設，或是之後的LT貿易等，政策都十分有一貫性。吉田茂並非掌握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而是確信中國必定會走入資本主義。他認爲若引發中蘇對立對於中國在國際上的立場必然有所影響。另外，外務省當時也認爲在不久的將來台灣的中華民國將會台灣化，變成由台灣人主導。有了這樣的認定，將中國、台灣兩者都視爲市場，在此範圍之內進行交流。這樣的意義下，「二個中國」所提示的方向性，不僅僅是戰後初期的既定方針，另一方面，也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交正常化」/與中華民國斷交之際的基本方針。可以理解爲，1972年斷交之際，維持台灣繼續作爲一個市場的存在也是基本方針。時至今日，從東亞到東南亞的這塊區域，基本上是對全世界開放的市場，到目前爲止並沒有發生過嚴重的紛爭。從這一點來看，二十世紀後半的五十年，可以說正是日本所盼望看到的結局。

發表如此的研究成果，而提出新的觀點時，「二個中國」研究的前線應是「二個中國」政策的演進過程，以及理念與實際的問題，再加以來自中國、台灣方面的不同觀點。關於政策的演進過程，佐藤內閣是否爲親台派，或是否因爲顧慮中國大陸才做成「二個中國」政策，諸如此類的爭點也都有所討論。然而，將焦點放在「二個中國」並去追究他的原委是絕對不會有結論出現的。因此，本文主要將重點放在1960年代，整理日本的「二個中國」論述，並試著加以探討。

第一章 1950年代的國會之「二個中國」論

本章，一方面將介紹五零年代國會的議論，就「二個中國」的議題究竟以如何的形式被討論，將舉事例來加以佐證。吉田內閣縱然已與中華民國建立國交，仍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具有實質意義的貿易關係並嘗試設立貿易事務所，這就是他所能開展的政策。雖然早先已有「二個中國」的政策，但在吉田內閣時代，若是使用「二個中國」這樣的名詞，即爲吉田書簡等書裡所提及的中國承認問題，究竟所承認的是「二個中國」中的哪一個中國呢？又1952年的日華條約爲何承認中華民國？本文大致上會沿著這樣的脈絡。但要知道的是，吉田茂本人在議會或其他地方，卻一次也沒有使用過「二個中國」這個說法。

(1) 鳩山一郎內閣期之「二個中國」(1954年12月-1956年12月)

¹ 請參照宮城大藏《戰後アジア秩序の摸索と日本：「海のアジア」の戦後史 1957～1966》（創文社，2004年）

將「二個中國」視為政策而全面推行的是 1954 年 12 月成立的鳩山一郎內閣。鳩山政權是在對美關係上清楚表明繼承吉田茂政權，對共產黨外交則是主張融合路線，進而接連贏得大選勝利的民主黨政權。在鳩山政權之後，1957 年 2 月岸信介內閣成立前，中間還夾著一個 1956 年 12 月成立且維持甚短的石橋政權。岸內閣雖也繼承了吉田內閣以來的政策，但由於國際情勢及中國政策一直有所變化，就「二個中國」所發表的議論也隨之有所變化。進入 1960 年代，池田勇人內閣、佐藤榮作內閣基本上都開始採取比較具體化的外交政策。

鳩山內閣是 1953 年社會黨代表團訪中的成果，也造就 1955 年 4 月第三次日中間貿易協定代表團（團長＝雷任民・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來日的契機，進而發展出中國論。3 月 25 日的參議院本會議，自由黨的小瀧彬議員質問北京代表團渡航證上所記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表示等同於「二個中國」²。鳩山回應「希望與蘇聯、中共的國交能有所調整，這有什麼不對的嗎？若是與蘇聯、中共的國交不做調整，持續無法確定戰爭狀態終結的情況，我認為是極端危險的。…（中略）因此我認為與蘇聯、中共的國交調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緊接著重光發言「中共貿易，在今日的問題可歸結於我方想要盡可能地推展中共地區與日本之間在國際關係上可以達到的貿易程度。從現今日本的經濟狀態來看，不僅當然要做，甚至應該要認為是不做不行的工作。」。因此有關COCOM的管制，他認為「雖然有COCOM的存在，但COCOM的範圍多少可以拓寬，不用多言也可以知道這對我方非常地有利。因此，在COCOM的內部要盡力與各國接觸，對外也應該要朝此方向做盡可能地努力。」表示管制對共產黨貿易的COCOM的確有在運作的軌跡。

當然，鳩山的態度在社會黨的眼中是「軟弱」的。社會黨的佐多忠隆議員等也指出了這個問題「大選的日子近了，一方面強調擴大日中貿易，漸漸也到了迎接使節團的時候，這樣可以說是完全地消極態度…（中略）…另外，美英對於台灣問題的意見不同調，態度也有差異，夾在兩著之間的日本，究竟抱持著如何的意見或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鳩山總理是否曾仔細思考？只是一味地強調不能不承認二個中國的存在，但這樣的想法之後會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呢？這是我所想要知道的。」針對這一點，鳩山有明確的回答。「特別是關於我的問題，對於我決定使用二個中國這個口號的想法，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改變，我們畢竟不能不承認事實，所以我認為用二個中國這樣的想法來解決問題是適當的。」鳩山總理面對隔天預算委員會的民主黨小坂善太郎議員的質問，做出了以下的回答³「現在同時有國民政府及中共的存在是歷史事實，我們希望他們雙方不要發生爭執。一方面沒有理由不承認中共存在的事實，國民政府就更不用說了，我認為承認雙方，即二個中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然而，「二個中國」並非是指同時承認雙方的含意。重光葵曾說過同時承認國際法上二個政府是不合理的，若是仔細思考這句話，可以發現就如同小坂議員所指摘的「現在的問題，很清楚地可以發現與

² 1955 年 3 月 25 日，參議院本會議事錄

³ 1955 年 3 月 26 日，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議事錄

前內閣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在鳩山內閣的方面，雖然「從與中共貿易的必要性來看，與中共政府交好，也就等同於調整國交關係」這樣的論點被認為是合理的。但實際上鳩山政權的「二個中國」論可以說是以下重光說法的濃縮。

今日我國承認台灣的國民政府，就如同大家所知。因此，今日將中共政府當作中國政府來加以承認，是條約上的問題，不如看作是法律問題，我想這樣的情況並不是馬上就可以解決的。然而中共在現實中的中國大陸有很強大的權力，地域上的確定已經是事實了。因此，並不能無視於這個事實。隨之而來，若是能夠促進與該區域的貿易關係，我認為應該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此一來，可以漸次建立正常國交關係，我認為這也是一件好事。但這樣的事情要怎麼用法律或是條約來作實際上的連結呢？由於必須順應世界一般潮流，我認為應該耐心等待時勢的變化，慢慢地考慮這個問題比較好⁴。

對於日本的產業來說，即便COCOM有管制清單，在可能的情況下基本上還是想要將中國加以市場化，而非承認共產黨政權這樣的論述。這個論述的目的不僅僅在於通商、貿易等方面，也隱含了「終戰」的意義。鳩山曾說過「因為有無法承認中共的情事存在，即使無法承認，也要達到確認戰爭狀態終結的狀態，並應使國交正常化。撇開承認問題不談，談到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狀態，需要了解到若雙方貿易關係緊密，又積極投入相互貿易，就能夠達成終結戰爭狀態的效果，因此朝這個方向發展我認為是比較恰當的，也應該要抱持著一定要努力與如蘇聯、中共等無法列入自由主義國家群的國家交好的想法⁵。」這裡所表示的「二個中國」絕非與中國締結國交，而是指終結戰爭狀態這個層次上的關係。然，關於當時承認中華民國一事，他曾表示「世界正在劇烈變化。我們要十分仔細地注意這個變化，以日本來說，不僅要密切注意仔細觀察這個變化。將來的事情一定也要有所考慮。若是真的演變成那樣，過去日本所採取的路線也會有全盤地改變，必須要考慮其是否符合日本的利益、是否為有利的計策等。如同我屢次所強調的，進行的時候要能明確地保有這不應該是那樣做的判斷能力⁶。」，這樣的說法也存在著某種含意。

(2) 岸信介內閣期（1957年12月-1960年七月）之「二個中國」

接替鳩山內閣的石橋堪山內閣、岸信介內閣就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關係上，基本上可以說是承襲了鳩山內閣的路線，但若將鳩山與岸放在一起比較，還是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其程度上的差別。岸在合理化解釋「二個中國」的同時，也強調日本承認蔣介石及中華民國這一點。因此他說過「蔣介石以德報怨，對於

⁴ 1955年3月31日，眾議院外務委員會議事錄

⁵ 1955年12月9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議事錄

⁶ 1956年3月8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議事錄

日本在戰爭中所做的一切行動，在在宣示要對我們做出寬大的處置。因而，誠如大家所知道的，這也就是與國民政府之間國交正常化的沿革。」用「以德報怨」這樣的口號，也許可以說「若完全無視於這樣的沿革和事實，進而建立一套理論，在我看來是非常脫離現實的。因此，從這個事實，或是姑且可以說二個中國這個實際上的狀況來發想，「二個中國」的理論應該也是可以成立的。」但同時有人表示以下的看法「就如何加以解決這樣的問題，中國的內政問題應該由中國自身來解決，視他們解決的成果來決定接下來該如何進行也是一種考慮衡量的方法。」另外，有關與聯合國之間的關係，「日本究竟是直接對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加以承認，或是透過聯合國的一員來表示承認呢？大體上，國民政府本身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要成為會員國或是有任何變動，若處於聯合國多數會員國尚且意向不明的狀態，在我看來這連解決問題的方向都還不存在。」又「以結論來說，我認為現在的情況還不到要發展政治性的關係的時候，但卻應藉此增進雙方貿易往來或是其他關係。」以上可以說是岸所認為的妥協線⁷。

當時，美國在 1956 年的國際紅十字會開羅總會，態度已轉變為採納「二個中國」的說法。相較於鳩山政權期，「二個中國」的概念在世界局勢上已經越來越強烈，時局反而轉變成日本是比較為中華民國著想的角色。事實上，岸政權在 1957 年自東南亞返國途中，曾暫停台灣並且與蔣介石會談，接收了反攻大陸等想法。但岸在不承認鳩山「二個中國」的同時，也並未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想法有任何確切的支持。可以知道即使是岸，也一直在從事促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文化、人事交流等各個面向的交流。1958 年在田中角榮在郵政大臣任內，開設了連結北京與東京的「直撥無線電話」⁸，另外在第四次日中貿易協定的備忘錄也認可了通商代表部的設置。然而，在這樣複雜的情勢之下，岸內閣不免也亂了腳步。就通商代表部的設置，有以下幾個條款，即「雙方基於互惠原則，給予對方通商代表部所屬人員出入境的方便、通關的禮遇以及以貿易活動為目的的旅行自由」及「通商代表部在業務執行上可以使用必要的暗號電報」。進而，特別在「通商代表部的建築物前，有權利懸掛本國的國旗」也成為問題的時候，可以發現於 1958 年 6 月官房長官赤城宗德發表應在外交上承認「二個中國」的言論後，外相藤山愛一郎卻是急忙否認的情況。當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建立國交，雖然有人指出蘊含保障「台灣」的地位與安全之「二個中國」論述被採用的可能性，實際上日本內閣官僚的發言卻是很混亂的。

因此，從當時開始，「二個中國」的含意也有所變化。吉田政權之後的鳩山政權，其主張的「二個中國」可以說是隱含有顧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義。相對於此，岸政權期並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雙方的主張為根據。中國方面持續宣傳日本「正在進行分裂二個中國的陰謀」，在日本國會這一點也被特別強調。岸首相一直都被認為是「反共派」。這也許與岸個人的背景有關，但也可以認為他同時反映了台灣海峽緊張的國際情勢。在 1958 年 5 月的長崎國旗事件後日本與北京的

⁷ 1956 年 3 月 8 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事錄

⁸ 1956 年 3 月 8 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事錄

關係進入完全的冷卻期開始，這樣的情況越發地嚴重。

1960年7月19日，池田勇人內閣誕生。相較於岸政權，就「二個中國」池田發展了更多的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他說「我觀察了世界的狀況，也好好檢討了今年聯合國的態勢，由於希望能夠獨立自主地來決定，現在若是做出結論反而對我國不利。」；關於貿易，他也明確表示「我是希望貿易再開並且擴大的第一人」⁹。

中國方面，池田內閣成立之後，周恩來發表了對日三原則。其中第一點是「日本政府不敵視中國」；第二點是「追隨美國，不操弄製造「二個中國」之陰謀」；第三點是「不妨礙中日兩國關係朝正常化方向來發展」¹⁰。池田曾說過「我現在只看到一個所謂的中國。因此我要說的是，所考慮的不是哪一邊的領土，而是CHINA的領土。」，漸漸捨棄所謂「二個中國」的說法¹¹。

簡單地歸納上述的說法，日本一方面想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國交，一方面想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關係，因此為消除種種障礙所做的政策，可以說是1950年代所一貫的外交政策。若是將這樣的想法及政策當成「二個中國」政策，我們可以說這正是戰後初期日本對中政策的基盤。進而，並非只是把中國看成市場，也有與支配大陸地區的政權終結戰爭狀態的含意。然而，各政權如何使用「二個中國」政策的用語，又這個用語在東亞國際政治史上究竟被放置在什麼樣的位置，並沒有一貫性存在。50年代前半的吉田茂政權，在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府間究竟應該承認哪一個呢？在二選一的情況下出現「二個中國」的說法。因此，52年的日華條約之後，在「二個中國」的前提下，就中華民國代表中國這件事，吉田書簡的意義也成了一個問題。至於50年代中的鳩山政權，「二個中國」毋寧是顧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積極規劃的政策。這在國際法上的意義是一個對政府承認問題的挑戰。50年代後半的岸政權則認為「二個中國」毋寧是作為否定「一個中國論」的論述，也毋寧是一個對中華民國有利的論述。這些問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權力平衡，因為各政權的性格特色各有不同，都呈現了不同的面貌。

第二章 1960年代之「二個中國」政策

(1) 池田勇人內閣期（1960年7月-1964年11月）之「二個中國」政策

如前所述，池田勇人內閣形式上接受了中國方面所提出的對日三原則，而不再強調「二個中國」。但池田內閣傾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的意義在於「二個中國」政策的開展，可以想見這也牽涉到美國的對中政策。這個時期的日本外交

⁹ 1956年3月8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議事錄

¹⁰ 1956年3月8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議事錄

¹¹ 1956年3月8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議事錄

政策，可以參閱日本外務省的記錄。

日本外務省的「美參」（美國局參事官）於 1961 年 3 月作成的一份文書「日本的美國政策」（極秘）揭示了很有趣的內容¹²。依該文件可知，「由於美國認為台灣未來將會從國民政府漸進式地移轉到台灣人的政權」且「台灣要想留在自由世界只有仰賴美國的軍事力才有可能」，因此「台灣將來的地位需視美國的態而定，並且必須與美國維持密切的聯絡。」而「美國與日本的中國政策，是將台灣留在自由世界的同時，也希望擴大與中共的接觸。兩者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而當時全然不同的是美國與中共之間存在有非常激進的對立，加上國民政府是在美國的軍事庇護之下，衡量諸內外條件，日本無法像美國一樣做出任何刺激中共的行動，對於國民政府也沒有那麼強大的影響力，因此，日本的中國政策不得不採取低姿態。」在此階段，與北京的關係融洽這件事也讓我們認識到日本的獨立性。具體而言，日本所想定的是「謀求擴大與中共人民的交流與接觸，並於適當的時期，即國內體制穩固的時候，計畫締結政府間的貿易協定等，以逐步發展至給予中共事實上承認的外交關係。」其明白表示「把目標設定在締結政府間的貿易協定，是因為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將維持現狀，而對於中共則是進行承認的動作。以日本的立場來說，只希望能夠成功建立與兩個中國的關係。」因此，「二個中國」可否說是「事實上的承認」，或 de facto 的承認也曾被討論過。

然另一方面，外務省內部在 1961 年亞洲局長的談話上，就中共承認問題一事，曾表示「日本並沒有承認中共的意圖。除非解決台灣問題，否則無法承認中共。中共承認的問題，一定要在美國與國民政府及中共的關係解決之後才能處理。」表示台灣問題是以美國為準則來決定處理的方向性¹³。

1963 年 10 月發生了中共油壓機器訪日代表團的翻譯周鴻慶在返國前夕逃亡的周鴻慶事件。當時周鴻慶前往中華民國大使館，而中華民國大使館也大表歡迎，但其後周卻表明要回歸中共，事態愈形混亂。最後周被引渡回北京。這也被評價為日本方面開始傾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表態。

又，1963 年 11 月，日本外務省國際資料部長之「關於國民政府對策」（至急・極秘）也說明了「國民政府會想要將日本徹底掌握，（中略）不得插手並必須敬而遠之，這也就是說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必須漸漸地疏遠。」這樣的想法。也提出了「在台灣，不要忘了被統治的台灣人與國民政府的人有完全不同的想法。」這樣的見解¹⁴。出現這樣的見解，在當時的政府或是外務省絲毫不覺奇怪。周鴻慶事件之後，吉田茂首相訪問台灣，並與蔣介石會談，當時吉田的發言包含有以下內容，「用經濟競爭的方式來擊垮共產主義集團，自然而然人民會對共產政權失望並且開始反抗，他們的勢力開始減弱，漸漸地就會想轉變成自由主義國家，這是世界的現況。此外，我們要讓共產主義集團內的人民知道自由民主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集團國家的生活狀態有如何的差別，才有意義。在這層意涵下，如果能與共產

¹² 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錄 2002 年 12 月公開分(0120-2001-00974)。

¹³ 1961 年 3 月 24 日作成、「張公使とア局長との会談」（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錄、2002 年 12 月公開分、0120-2001-00974）

¹⁴ 1963 年 11 月 6 日作成、（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錄、2002 年 12 月公開分、0120-2001-00974）

主義集團在貿易及人民往來方面盡可能地交流頻繁，我認爲也是打倒共產政權的一條捷徑。從這樣的觀點來看，中國方面也可能認爲日本的中共貿易是使大陸人民脫離中共政權的一個好方法吧！」當然，他也有所保留地說「不論是池田總理或是任何人，既然日本儼然是個保守政權，政治上承認中共，或是建立外交關係的想法是絕對不存在的。」

1964年1月17日所寫成的「與中國政府應會談事項（發言要旨案）」，在反攻大陸的部分很明確地說「被問到贊成與否的情況下，不得不反對」，在表達了與岸政權時期不同的見解時，就於中國開設貿易事務所一事，以JETRO日本海外市場調查會或是政府職員的「長期出差」的型態來進行等事，將會做通盤的檢討¹⁵。於1964年2月21日到28日吉田茂訪台時，蔣介石對吉田茂進行牽制，述說「近來國際間加強對中共的援助，抱有離間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使其轉而投入自由陣營的想法。但這是不正確的。現在正是計畫消滅中共的大好時機。」之後，1964年7月3-5日大平外相訪台之際，蔣介石明白說了「二個中國是行不通的。」

然而，實際上，我們可以發現這段時間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多有所進展。1962年9月，松村謙三（自民黨顧問）訪中並與周恩來進行會談，進而同年11月9日，相當於準政府間協定的「日中備忘錄貿易協定」是由廖承志（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與高碕達之助（前通商產業大臣）所簽訂的。據此可知日中貿易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這個協定是取兩國代表廖及高碕的第一個字母而稱作「LT貿易協定」，兩國也各自在對方國內設置聯絡事務所，協商以強化經濟交流。依據這個LT貿易，兩國間的貿易關係是半官半民的，相較於之前的「友好關係」，品目及金額都有所擴大。這樣的貿易狀態，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持續進行。關於這些轉變，爲尋求中華民國方面的理解也持續做了許多調整。但這些轉變也顯示了「二個中國」論述具體化的情況。在議會，日本是否已經承認「二個中國」這樣的質詢內容也接連不斷地被提出。

池田總理的立場，在聯合國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最初曾說「關於二個中國，不論中華民國或是中共政權不是都說過絕對反對了嗎？我們都是第三國，若是對這樣的問題下結論，我認爲在外交上是很不高明的手法，也不是該做的事」¹⁶。

(2) 新的台灣論-「一中一台論」的出現

另一方面，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言論，即「一中一台論」。這並非後述的佐藤內閣時期所使用之意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國民政府」的「一中一台論」。而是徹底將焦點放在「台灣」的言論。當時的史料雖然從未稱呼其爲「一中一台」，但從內容上來看，與現在的「一中一台」是非常相近的議論，因此我在此就這樣稱呼。當時，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交正常化一事具體地進入視野範圍的時候，

¹⁵ 1964年1月17日作成、「中華民國政府と話合うべき事項(發言要旨案)」(アジア局長作成、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録、2002年12月公開分、0120-2001-01331)

¹⁶ 1961年9月29日、衆議院本會議議事録

也開始發現到一些關於「台灣」的新見解。這既是國際情勢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日本本身被課以「脫殖民地化」的緣故。首先，讓我們先來看看外務省中國課的台灣基本分析。

這樣的準戰時體制，相對於該政府以及與該政府一同由大陸渡海前來號稱有 250 萬人的人口，出身於台灣的總人口在 1100 萬的人口內存在有約佔 850 萬絕對多數的台灣人，這兩者的利害未必一致也是實情。行政當局在需要負責任的職位上只採用極少數的台灣人，政治經濟上的發言權也幾乎是禁止的狀態。一方面台灣先前在我國將近五十年的統治之下，產業文化高度發展，且經濟、教育上的水準也相當高，台灣人即使現在仍對我國仍懷抱著好感。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台灣出身的人對於自己故鄉的政治，理所當然地會希望被賦予自由的發言權，而更進一步產生獨立的想法絕非不自然的事情¹⁷。

因此，台灣人的優越感，及「台灣人的台灣」的見解也散見在許多外交文書。
(1) 身為國民政府，也要拉攏台灣人，而逐漸演變至不得不走向民主化的情況。但表面上還看不大出來。在台灣的將官據說有 1800 人，但是台灣人的將校卻僅止於少校。(2) 在推動台灣人成為國民黨員上非常成功。但出席「黨大會」並入黨的台灣人絕對不會感到榮耀，不如解釋成是不得已入黨的¹⁸。

指出中華民國不得不收買台灣人之後，進一步我們發現國民黨在收買的計策上有其界限。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方面有自日本殖民地統治尋求優越感的傾向。這就是有美化日本統治時代傾向的台灣社會，被認為接受了這些，而未於抵抗舊宗主國時產生對日本的脫殖民地化，也表現了在複雜情況下所產生的問題¹⁹。

這樣的方向，我們可以看到於 1964 年 1 月 21 日駐台北的木村大使所撰寫的「為改善日華關係之考察」。這份文件很明白地表示重心是放在「台灣人（本省人）」之上。這是關於「二個中國」在客觀的狀況下被進行的，但以日本來說，前提在於「對住在台灣的 900 萬台灣人需要負擔與本國的日本人相同的責任」，他們認為

¹⁷ 1963 年 4 月 27 日，〈中華民國の政情について〉（中國課，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錄，檔案管理番號 0120-2001-05162）

¹⁸ 1964 年 2 月 18 日，〈吉岡參事官の台灣事情に関する説明〉（中國課，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錄，檔案管理番號 0120-2001-01331）

¹⁹ 當然，日本方面對台灣獨立運動並沒有允諾的理由。外務省所完成的文件〈台灣獨立運動について〉所述如下。「台灣獨立運動在 1950 年左右開始，將根據點移至本國。1956 年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由廖文毅就任大總統。…如上所述，台灣獨立運動一時之間看來非常熱絡。但 1962 年後半以來，由於對廖文毅欠缺領導力的不滿，內部開始分裂，1963 年的 228 紀念活動以東京為始，各地也都極其低調。中國方面對於任何台灣獨立運動都強烈要求嚴格取締，但由於實質上的活動狀況已經低調到完全不得稱呼其為政治活動的程度，我國幾乎無法得知。另外，由於並不存在對外國人的政治活動特別禁止的法令，政府以一般國內法為基礎，進行其容許之最大限度的取締。」1963 年 5 月 1 日，〈台灣獨立運動について〉（中國課，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錄，檔案管理番號 0120-2001-05162）

「應該將雙方各種的協力合作作為我國亞洲外交政策的一個基調」。這個想法的背景在於「今日若失去信賴，不僅我國在台灣 50 年的統治將成為泡影，未來也可能會失去戰後亞洲最親日的基礎」的觀點²⁰。進而，「本省人對外省人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加上對日本的信賴感，台灣人開始認為自己是完完全全的台灣人而非中國人，這樣的感情漸漸形成一股不可忽視潛在趨勢。」，加以「台灣應該回歸台灣人的手中，這是歷史的必然。」，由於外省人的老化及美國的壓力，「我方要加強對本省人的發展，並應扶植親日勢力，研究對策並請加以實行。」

然而，世界的趨勢已經開始朝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無法承認「二個中國」的狀況下，若要說台灣曾經以台灣作為定位的方向，而認為台灣可以用台灣的名義進行獨立的想法，是不確實的。舉例來說，於 1964 年撰寫的「關於對台灣政策」，其認為「客觀上來看，台獨運動欠缺適當的指導者，組織也呈現四分五裂的狀態，又，將來「台灣人的台灣」在當地變成實際上的運動時，至少一般來說是看不出來日本握有任何台獨指導權的。²¹」即使可以預想到台灣會演變成台灣人的台灣，作為一個政治主體，要收斂到什麼地步卻不是很清楚。

另外，在政治家方面，不論是台灣獨立或是日台聯合王國論，各式各樣的謠言對「台灣」的承諾都大不相同。下一段所擷取的是佐藤榮作日記上的記載：

【1971 年 12 月 23 日】十二點半，在官邸與來日訪問的李連春先生會面，他是我的舊識。現在是台灣政府的部長。行禮之後，就開始談起今後的打算。大致上從蔣總統的想法來看，獨立黨還是有稍微地在運作。也許是純台灣本島人的立場吧？對此我是不能同意的，因此有些出乎意料²²。

在佐藤的日記裡幾乎無法看到對「台灣」表示承認的記載。然而，不變的是，佐藤充分瞭解到「純台灣本島人」與蔣介石有不同的立場。這一點不僅外務省明白，政治家也明白，恐怕可以說是共識了。在 1960 年代也有很多人預言現在的中華民國、國民黨的體制在維持上有其困難性。

(3) 佐藤榮作內閣期（1964 年 11 月-1972 年 7 月）之「二個中國」政策

佐藤榮作總理在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擔任代表戰後日本的總理職務。他是岸信介的親弟弟。在卸任總理的職位後，1975 年 5 月 9 日的日記有如下的記載²³：

千葉三郎出現，並主張台灣應該早日獨立。而我則是反對的。不干涉中國內政，著重於通曉實際上的狀態，但一再地因為田中內閣在二個中國論上的錯誤無法做到。現實中哪裡都有施政權所不及的地區，由於我們很重視至今

²⁰ 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錄，2002 年 12 月公開分，0120-2001-01331

²¹ 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錄，2002 年 12 月公開分，0120-2001-00974

²² 「1971 年 12 月 23 日」（《佐藤榮作日記》朝日新聞社，1997-99 年）

²³ 「1975 年 5 月 9 日」（同上史料）

的沿革，若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本身認為韓國與北韓，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都是不同的問題，或說中國只有一個，他認為這是都很讓人為難的。他說過由於二個中國論不能說出口，一個中國論也不該多說。一個也不是二個也不是，一加一是一加一，要說答案是二未免太早了，這些在台灣說過的內容他已經反覆主張再主張。

在某種程度的意義上，這段文字明確地表示了當時佐藤的主張。

在過去的研究，佐藤被認為是「親日派」。另外，也有人說在佐藤卸任後，由於田中總理的出現，1972年才能開始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交正常化。然而，若我們看了如田川誠一的回顧等文獻，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未必佐藤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就代表在最終的承認上是消極的角色²⁴。佐藤在就任總理之前，於1964年5月14日參加在東京舉辦的中國經濟貿易展，並且與經濟友好代表團團長南漢宸對談，提到「我認為朝向政經不可分的方向進行是值得高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過去就一直批判日本「政經分離」的政策。對此，佐藤可以說是一面接近中國，一面也嘗試尋求問題的解決。

佐藤總理就「二個中國」的觀點，展開了非常有趣的論述。就任早期於1965年1月訪美，與約翰遜總統、國務卿腊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人進行會談。然而在準備文件上卻對美國表明以下的期望「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方式是比較符合現實的，希望能從極東安全保障的觀點，用相同的方針來圓滿解決。而問題就在於作法以及時機，希望日美間能保持密切的聯絡。」美國方面，就聯合國的席次等事是否移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抱持著慎重的態度。佐藤聽聞「美國將保護台灣到底」，而約翰遜表示「正是如此，美國是不會放棄台灣的。並且使國民政府的血壓不要上升是最要緊的。像是國民政府主動退出聯合國這類的狀況應該要避免。」。外務省則歸納如下「美方高層對中共態度強硬，短時間內幾乎不可能看到美中之間有任何稍微妥協的可能性，關於日本的中共承認問題，美方的反應則是非常嚴厲的。」

這裡所闡述的「一中一台」並非意指台灣獨立，實質上與「二個中國政策」等同。然而，在這裡的「台」=以「中國」正統政府自居的中華民國，表示的含意卻也非為承認中華民國。

1965年6月，椎名悅三郎外相將訪歐一事及與戴高樂會談的文件完成，當時仍表示「我國與中共的關係未來並沒有在根本上做調整的打算，會避免與中共發生不必要的對立，依循著「政經分離」的方針，將政治上的關係分離開來，以貿易及其他經濟面為主來與中共持續進行接觸，希望可以避免兩國之關係較現狀更加惡化。」而就「二個中國」，其表示「以中國問題處理方式來看，有「一中一台」這樣的想法。實際上大陸與台灣是一個個分別存在的政權，從這一層意義出發而採取這樣的方式處理也是很自然的。從極東的安全保障觀點來看，我認為也是值得讚許的一個方向。國民政府、中共卻同時對這樣的方式表示強烈的反對。因此

²⁴ 田川誠一《日中交流と自民黨領袖たち》（讀賣新聞社，1983年）

目前現實的問題仍無法解決。」。椎名外相 7 月訪歐，20 日到法國與戴高樂總統會面。戴高樂總統曾說「即便假定將來的結局是台灣獨立於中共的存在被承認，法國對此也不會打算提出任何意見。」，以此支持日本「一中一台」的論點²⁵。

這個時期的「一中一台」論，雖然已經蘊含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義，卻也同時點出台灣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的意涵。這樣的論點，其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維持著一定的距離。

佐藤總理，在與張群會面時曾述說「從周恩來、毛澤東或陳毅等人最近的發言及中共原子彈實驗的角度來看，兩者無法同時進行的想法已經越來越清楚了。」其後，特別是因為 1968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交流開始有所限制。進入 1970 年之後，佐藤在施政方針的演說上，曾說過「從經濟、文化、新聞報導等各方面來累積，我將會積極地推動日中之間交流。」，稱呼則是採用「北京政府」，而非「中共」²⁶。其後，開始加強日中之間的貿易關係。翌年，即 1971 年 1 月 22 日的施政方針演說上，終於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稱呼對岸，並暗示「已準備好要進行政府間各項接觸」²⁷。

然，這並非表示佐藤「親中」，佐藤一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批評為親台。特別是在聯合國的代表席次問題上，他努力地想保住中華民國的席次，進而提出在維持中華民國安理會席次之狀態下，同時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的「二重代表制」，卻被美國否決。這也是佐藤式意義下「二個中國」論的一個例子。其後，美國於 1970 年 7 月 16 日派遣季辛吉前往中國，尼克遜亦於 1971 年訪中。而佐藤在關注美中關係的同時，卻無法立刻下定決心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可以歸咎於「台灣」的地位懸而未定。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總會上的阿爾巴尼亞提案，由於贊成 76 票，反對 35 票，17 票棄權而遭到否決。在日本共同提案的「逆重要事項指定案」以反對 59 票，贊成 55 票，棄權 15 票遭到否決之前，佐藤一直努力要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

該聯合國決議，對日本的「二個中國」政策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大略的既定方針，再來就只剩台灣的地位問題了²⁸。佐藤內閣，在廢棄 1952 年日華條約之後，政經分離的原則下，希望能與台灣保持「經」的部分關係。佐藤這樣的態度，引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悅，在無法得知大陸方面就佐藤的對中國政策有何反應的情況下，田中內閣上台了。

結論

綜上所述，日本在維持與中華民國有國交的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關

²⁵ 日本外務省保存記錄，2002 年 12 月公開分，0120—2001—01577

²⁶ 1970 年 2 月 14 日，眾議院本會議議事錄

²⁷ 1971 年 1 月 22 日，眾議院本會議議事錄

²⁸ 福天糾夫《回顧九十年》（岩波書局，1995 年）

係也有所發展，因此出現許多爲了消除各式各樣障礙的政策。1950-60 年代可認日本有其一貫的外交政策。但從「二個中國」的觀點來看，並沒有所謂的一貫性，且常要對應國際情勢來變動。事實上只有鳩山內閣是以推動「二個中國」的說法來進行外交，其他的政權對於使用「二個中國」這樣的用語都格外慎重。

然，若是從政策的內容面來看，有國交且「政經」兩方面的關係都有所發展的中華民國，與沒有國交且必須採取「政經分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要推展什麼樣的政策？這是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課題。在這一層意義下，1950-60 年代之「二個中國」論述，大致整理如下。

1950 年代前半的吉田茂政權期間，對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政府究竟要承認哪一個，二個要選一個的情況產生了「二個中國」問題。1952 年日華條約之後，「二個中國」的前提下，關於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一事，吉田書簡的意義也是一個問題。1950 年代中葉的鳩山政權，索性將「二個中國」定位在充分顧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積極政策。1950 年後半的岸政權，則是將「二個中國」定位爲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中國論」，且對中華民國有利的論述。而 1960 年代前半的池田政權受到中國方面提出對日三原則的影響，改採「一中一台」論，而非「二個中國」。這裡的「中」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隱含其將正式承認的意思。「台」並非指的是獨立的台灣，而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雖預期台灣於不久之後會成爲「台灣人的台灣」，在「台灣獨立」的路線上，日本政府卻也是抑制的。1960 年代後半的佐藤政權，很快地就確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向性，認爲不應將「一十一」當成「二」這樣的統一體，而應將「+」區別來看，也不是指「一」、「一」應該分散，而是要討論各自以各自的狀態在未來要如何維持下去的問題。